



BOURDIEU

张 意 著

文化与符号权力

——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BOURDIEU



张意 著

文化与符号权力

——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 / 张意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7

ISBN 7-5004-5118-0

I. 文… II. 张… III. 布尔迪厄, P. (1930~2002)
—文化社会学—理论 IV. ①B565.59②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9845 号

责任编辑 汪民安
特约编辑 冯惠芬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任菊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010—64031534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插 页 2
印 张 11
字 数 236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 道路的选择：实践与反思	(5)
二 文化的田野工作.....	(8)
三 争论和回响	(22)
四 问题的缘起和方法	(31)
第二章 批判和反思——实践理论	(45)
第一节 实践的逻辑：身体、习性和误识	(45)
一 身体维度的“实践逻辑”	(45)
二 核心概念：习惯、场域和资本	(56)
三 认识论实验	(78)
第二节 语言观：语言与权力	(89)
一 语言与结构	(91)
二 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影响	(95)
三 实践语言观：语言和符号权力	(105)
第三章 文化理论（上）：文化、资本和权力	(123)
第一节 文化与社会区隔.....	(123)

2 文化与符号权力 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

一	作为资本的文化	(127)
二	文化资本的传承	(132)
三	文化：社会区隔的标志	(137)
第二节 康德美学的社会学批判		(149)
一	康德美学：纯粹美与自律	(151)
二	康德美学与大众审美观的对立	(156)
三	艺术的边界：社会炼金术的产物	(165)
四	个案和启示	(170)
第三节 符号权力与社会巫术		(172)
一	习性、信仰和符号权力	(174)
二	经验、性别和身体	(178)
三	教育、再生产和有限的民主	(184)
四	媒体、市场和幻象	(195)
第四章 文化理论（下）：理性、知识和权力		(201)
第一节 知识分子反思		(201)
一	反思观：对“唯智主义”的治疗	(204)
二	独特的反思方案	(206)
三	知识分子场域及其分层	(212)
四	知识分子的自主性	(222)
第二节 立场：坚持历史的理性方案		(228)
一	帕斯卡尔的启示：理性的边界	(228)
二	理性反思：反学究谬误	(234)
三	继承与反思启蒙遗产	(238)
第三节 捍卫理性的知识政治		(248)
一	反“专家治国论”和“大众传媒学”	(251)

二 科学研究和伦理关怀.....	(257)
三 普遍的法团主义.....	(267)
第五章 文学场：一种社会学解读..... (270)	
第一节 文学场的逻辑	(270)
一 作品的科学.....	(271)
二 重构文学场域.....	(274)
三 文学场的历史性生成.....	(276)
四 趣味、纯粹目光和区隔.....	(286)
五 文学场的斗争.....	(287)
第二节 穿越二元对立的文学观	(290)
一 外部批评传统：“器物”文学观	(295)
二 内部批评传统：本体文学观.....	(300)
三 否定二元对立的设计方案.....	(305)
四 福楼拜的启示.....	(313)
五 评价.....	(319)
结语.....	(327)
主要参考书目	(335)
后记.....	(345)

第一章 緒論

文化作为人类生存的本质特征是我们理解自我与本我、小我与大我，个体和世界关系的必经之途。然而文化绝不是静止的人类行为的档案记录，文化的各种符号体系无不形塑着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和相互交流的基础。为逃避人类个体生存的偶然、脆弱和荒谬性，个体必然将自身置于群体的文化体系之中，以获取价值和意义。因此无处不在的差异和竞争渗透着社会生活。文化符号正是在冲突频繁的社会舞台上，扮演着区隔差异、标示等级的关键角色，与此同时又巧妙地、不易察觉地掩饰着自身的表演。而分工细密、体系庞大的现代社会正日益依赖文化符号的象征暴力，来巩固和维持它的支配秩序。这正是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的文化社会学的核心思想。

当全球化的脚步不可阻挡地进入我们的视野和生活，无论是来自历史的影响，还是现实的国际政治、经济的新型关系，抑或是媒体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它们都对日常生活、现实经验和文化观念构成了多层面、多方位的冲击。不得不面对的生存经验，逼迫和激发我们从内部批评转向更具包容性、和阐释力的研究范式，转向对复数、动态的文化的关照。例

如，怎样理解文化生产的相对自律；如何认识消费经济时代，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关系；怎样呈现文化和意识形态权力的关系等复杂问题，这些都是我们追溯布尔迪厄文化理论的原动力，是将布尔迪厄文化理论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理问题进行研究的最初冲动。

布尔迪厄是法国继涂尔干之后的最重要的社会学家。在当今法国人文思想界，他的影响和地位，堪与 20 世纪 50 年代的萨特和 80 年代的福柯媲美。80 年代以后，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渐渐受到众多领域的青睐，越出人类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学科藩篱，频频亮相在全球范围内的文学理论、文化研究场域，甚至连西方学术圈外的报刊、媒体都卷入“布尔迪厄现象”的讨论中。

布尔迪厄并不是一个喜欢抛头露面的“公共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在许多重大的社会、政治关头，他更愿意保持低调。在他看来，仅仅通过在请愿书上签名或到电视上露面来表达社会良知是如此肤浅和草率。他赞同以关切现实经验的问题意识为指引，从学理和思想的层面进行自主深入的探索。在近半个世纪的研究生涯里，他无视学科的陈规和界限，从社会场域和行动者习性的相关性切入，考察社会和文化方方面面，对文化和社会等级合谋施展的巫术进行“解魅”。

90 年代以来，他无法坐视全球化消费意识形态、媒体网络对自主学术的侵蚀，以及对弱势群体的无情且无声的劫掠。强烈的忧患感促使他从封闭的象牙塔里站出来，直面来自政府、党派、跨国经济集团、媒体的各种有形无形的权力。他从“专家型知识分子”逐渐转变为以学术干预社会公义的“科学知识分子”，继续捍卫自主的“知识政治”，质朴刚健地

战斗在反全球化、反资本主义体制化的舞台上，受到学术圈内外的广泛关注。

2002年1月23日，布尔迪厄因癌症在巴黎辞世，终止了他求索不息的思想历程。噩耗传来，《世界报》为了在首版登载这一消息，竟推迟了几小时出版。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电视在头条新闻的位置播报这一消息，并传达了法国总统、总理等社会要人和学者们对他的哀悼。^①在中国，不少思想与理论刊物都发表了纪念文章，人们试图从各个侧面来评说和追忆这位“说不尽的大师”。并且随着文化研究和传统人文学科的深入对话，布尔迪厄的文化理论及其应用，已经成为这一领域里的重要话题。

布尔迪厄如此轰动的影响力不仅与他的社会学成就有关，还因为他激活了自左拉、萨特以及福柯以来的法国批判知识分子的传统。布尔迪厄的科学研究和社会批判作为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显示出持守学术自主品格的知识分子对公共领域的关注和参与，也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科学知识分子对自主性的切身反思和新的建构。面对纷纭变幻的世相，布尔迪厄提出“知识分子何为”，“社会科学何为”的问题。^②那么，他是如何从社会科学探索和直接的社会干预两方面，来回答这个难以回避的重大问题的呢？

^① 卡尔洪、华康德：《社会科学和社会良知》，张怡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10期。Translated from *Thesis Eleven*, Number 70, August 2002: 1—14. 布尔迪厄的社会影响还可从法新社引用法国总统希拉克的评价看出：“布尔迪厄是积极力行的思想家，也是推动思潮的积极分子，此双重形象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他为饱受苦难的人们所作的努力将成为历史上最深刻的见证。”

^② 《中华读书报》2002年2月27日，国际文化版。

在学术场域内部，布尔迪厄的理论和方法也成为多学科、多领域的思想资源。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样的内驱力指引布尔迪厄不断延伸其庞大的研究计划，跨越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划分，深入到政治经济制度、公共空间和文化艺术等各种文化符号领域？又是什么样的学术立场和入思路径使他在广阔的社会场域和文化生产中，发现他人见而未见、闻而未闻的事实呢？近年来，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理论越来越多地被译介到中国的文化思想领域，对于这种有力而深刻的思想，我们如何理解和消化？他的文化理论在何等程度上有助于我们解决当代社会系统和文化生产相纠缠的复杂问题？

带上这些饶有兴趣的问题，探索布尔迪厄文化社会学的内在理路，也许更加符合布尔迪厄“反思和实践的社会学”的精神要旨。无反思地接受任何自明的理论或社会事实，在他看来既有悖社会科学追求知识真理的初衷，更损害知识分子担当伦理道义的良知。^①因此，我们阐述和解读理论的目的绝非一种概念游戏或理论消费，而是一次参与到文化批判和反思传统的实践。我们认为，首先需要像布尔迪厄那样思考，然后越过布尔迪厄，而且在需要的时候通过反对布尔迪厄的观点开始思考。由此看来，理论对于我们而言不是终极的目的地，而是我们可资借用的、解决问题的“工具箱”（tool box，维特根斯坦语）。

^① 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李康、李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其中第一部分，第七节《理性、反思和政治》。

一 道路的选择：实践与反思

布尔迪厄属于经历过 60 年代反本质主义思潮洗礼的一代，然而和他的同龄人，如德里达、福柯等相比，布尔迪厄的大师地位直到 80 年代才得以确立。从 50 年代末开始的社会学研究在此时结出硕果，一批对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问世，为他带来世界性的声誉。即使成为广受关注的介入型知识分子后，他依旧没有放弃警觉的反思意识。在法国知识界中，他和同道德里达、福柯一样，都力图做主流知识传统和社会支配游戏的清醒的旁观者，并致力于发现被习惯意识所蒙蔽的事实。

出生在法国西南部偏远山区小村的布尔迪厄，父亲是个乡村邮递员，以后进入法国知识分子的摇篮——巴黎高师（涂尔干、萨特、雷蒙·阿隆、列维—斯特劳斯、福柯和德里达都毕业于此）。^① 在巴黎高师求学时期，布尔迪厄在哲学专业的学习出类拔萃，同时他的政治意识也明显地成长起来。他反对斯大林主义和保守主义体制；他站在左派知识分子这边抨击法国殖民政策。布尔迪厄与那些出身富有、有文化优越感的精英子弟始终格格不入，因此他从未认同精英政治论和唯智主义传统，也从未把自己的成功视为个人能力和艰苦卓绝的斗争的结果。他清醒地意识到，名牌大学、知识分子场域的神圣化仪式具有的巫术效应。卡尔宏在一篇纪念布尔迪

^① 在《布尔迪厄和文化理论》的序言里，Bridget Fowler 曾这样评价布尔迪厄的早期经历和他的社会学成就的关系：“像他后来的理论伙伴雷蒙·威廉斯一样，他也来自大都市以外的边远乡村，也就是说，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农村地区。在许多著作中他都曾谈到这一生活经历，回顾并剖析了他所体会到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生活的巨大矛盾。”（译文略有改动）

6 文化与符号权力 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

厄的文章里这样说道：“个人的天才与勤奋，加之政府奖学金的帮助，把他推向了法国文化和国际社会科学的顶峰。”^① 应该说，卡尔宏的评价与布尔迪厄的反思立场是基本一致的。

大学毕业后，在阿尔及利亚服兵役期间，他亲眼目睹了殖民地和殖民战争可怕的现实，这是布尔迪厄从哲学进入社会学的转折点。华康德指出，这一转向有个人层面和知识层面的原因。^② 就个人经历而言，阿尔及利亚战争深深地唤起他关怀现实、知识分子的反思和批判的政治冲动。他不满足于仅仅在请愿书上签名，而希望用科学研究揭示社会苦难的来龙去脉，以自主性的学术批判介入社会。

从知识层面而言，布尔迪厄的研究工作是在战后法国学术场域中展开的。考察他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建构，必然要与这一特定语境中的知识分子话语联系起来。^③ 布尔迪厄的学徒时期正值法国知识界盛行存在主义学说的 50 年代。在他看来，存在主义夸大了主体的主观选择能力，对制约性的、前在的社会客观结构置若罔闻。他有意识地避开这种“主体哲学”，而接受了加斯通·巴什拉、乔治·康吉翰姆、尤利斯·维勒敏的历史理性主义思想，并且沉溺于胡塞尔、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此后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结构主义理论登上思想舞台，对布尔迪厄最初的理论积累和研究路

^① 克雷格·卡尔豪恩、罗克·华康德：《一切都是社会的：缅怀布尔迪厄》，李怀亮译，《文化研究》2003年第4辑，第3页。

^② 华康德：《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张怡译，载《文化研究》2003年第4辑，第233页。

^③ 也见 David Swartz, *Culture and Pow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pp. 53—55.

径的选择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结构主义把“关系的方式”带入社会科学研究，并且为研究社会现象的经验学科——社会学提供了走出实体的、本质主义研究的方法。

然而，阿尔及利亚的田野考察使布尔迪厄越来越怀疑结构主义人类学方法的可靠性。在对当地人的时间意识、生活经验和社会空间做了深入分析后，布尔迪厄意识到结构主义的客观“规则”完全抛弃了主观再现的能动性，将一切社会和文化都看作结构性的制度和规则的总和，个体行动者不过是结构的承担者和被动执行者而已。这种超越历史的、恒定的共时结构，如何解释精神结构对规则的主观内化，又如何说明实践者的生成性活动？社会结构的确限制着实践，但支持主观再现的精神结构在下意识中协调着实践活动，由此，布尔迪厄开始抛弃结构主义的“规则”而选择了前意识的“策略”概念。^①

实践使得客观世界的规则被内化为行动者的“习性”(habitus)，习性生成实践，即与不同的场域(field)相关的具体的“策略”行为。实践必然遵循“模糊的逻辑”(fuzzy logic)，而不是“理性的目的逻辑”。布尔迪厄认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身体和精神的对立，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日益脱节都是人为的、虚幻的对立，都无益于揭示社会世界的真实逻辑。他试图从实践的维度消解在社会学，乃至哲学传统中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这一意图也

^① Cheleen Mahar, “Pierre Bourdieu: The Intellectual Project”, in Richard. Harker, Cheleen Mahar and Chris . Wilkes eds, *An Introduction of the Work of Pierre Bourdieu*, Macmillan , 1990. p. 44.

深刻地体现了他在方法上的关系主义和综合性的特点。

沿着实践的逻辑透析社会生活的研究意识，激发布尔迪厄推动他的“认识论试验”(epistemological experiment)，或者说认识论反思(epistemological reflexivity)。他批评笛卡尔式的身心分立论，反对以外部客观的、优越的姿态观察研究对象的唯智主义传统。社会科学的反思方法，反对毫无反思地将观察者的偏见甚至常识混入严格的科学分析；反思方法必须反观研究者与所属场域的关系，研究者的科学习性、所继承的方法、概念，彻底地捍卫历史主义的理性观。反思立场无疑给予知识分子迷信其“符号生产”(symbolic production)能力和自居为真理守护者的自恋意识以致命一击，与福柯指出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处。反思方法促使知识分子注意到，社会历史条件经过复杂的内化过程已融入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知识分子必须经过冷静而科学的反思，充分地警惕社会权力机制的隐秘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维护知识分子的相对自主地位，同时形成一种有力的抵抗政治。

二 文化的田野工作 (fieldwork of culture)

布尔迪厄曾多次称自己的工作是“哲学的田野工作”，意指结合经验调查和理论建构的“参与性社会学”研究。排斥经验研究的哲学冥思，掩盖和自然化了社会及知识场域的等级区隔，脱离生活实践的流动和丰富的事实（见他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社会学批判）；而绝对的实证研究则陷入唯方法而方法的琐屑材料中，同样不能透彻揭示社会世界的隐秘神话。在他长达四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涉足广泛的研究领域，从

未局限于既定的学科藩篱，这使得他不受制于特定学科的成规教条，敢于从独特的视角发现未被发现的事实；同时也推动他开放性地吸纳丰富的理论和思想资源，超越众多社会场域，研究其内在逻辑。布尔迪厄切入问题的意识和路径，使他将文化看作由社会——历史形塑的特定符号体系。在他看来，文化与日常生活实践是两个几乎重合的词汇。这样他避免了抽象地将文化还原为社会结构，或者奉为由语言和文献承载的人类创造性成果的单面认识。鉴于布尔迪厄的方法和研究成果在文化研究领域产生的深刻影响，我们不妨把他的工作称为“文化的田野工作”。^①

1. 研究和著述历程

60年代，他在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对农村生活方式的变迁做人类学研究，以后回到法国本土继续社会学研究。在具体的田野工作中，他形成了独特的“实践理论”，试图超越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的二元对立。最初的理论和方法探索体现在《实践理论大纲》和《实践的逻辑》两部著作中。他与同事一道分析现代社会的教育体制与经济、政治力量如何联袂再生产社会等级，该研究汇集为《教育、社会和文化的再生产》。他逐渐意识到文化生产领域中的“自然”表象所掩盖的权力运作。教育体制正是社会等级得以巩固的最佳巫术执行所。在为教育的神圣解魅途中，文化资本概念逐渐成熟。布尔迪厄意识到被文化符号所否定的利益逻辑，他萌生了从实

^① 这里借用 Nicholas Brown 和 Imre Szeman 在其主编的《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的田野工作》文集中的标题，以说明布尔迪厄对文化研究的巨大影响和独特贡献。

践理论角度研究文化政治经济学的思路。

继而，他发现社会分层和趣味之间存在着有趣的对应，他试图揭示摄影者主观趣味和摄影者的社会位置之间的联系（《摄影：一种中层艺术》）；他调查了欧洲各国博物馆的观众和他们的艺术爱好（《艺术之爱：欧洲博物馆及其观众》）；他在《区隔：康德美学的社会学批判》中截取法国各阶层成员的生活风格、鉴赏趣味、饮食起居的横剖面，剖析行动者的趣味与他们的社会区隔的对应关系；基于此，他写作了《艺术的法则：19世纪法国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大胆而谨慎地对文化艺术领域进行社会学祛魅。在对趣味和艺术场的研究中，布尔迪厄进一步贯彻他提出的具体的经验研究和重大理论问题的建构相结合的思路。

同时，对学术场域和知识分子传统的反思立场，推动他写作了《国家的精英》、《学术人》。既然文化是使现代社会权力运作合法化、正当化的渊薮，那么对符号生产者及其场域保持警觉是必需和必要的。他对于知识、权力和理性的思考，在此后的《帕斯卡尔的沉思》里深入而细致地得以展开。抛弃超验的科学理性，建构历史的科学理性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

90年代后期，他对社会不公的批判更为直接和坦率，先后发表的著述对性别支配、文化自治、新闻媒体、社会苦难和消费社会的诸多弊病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分析和批判。与许多为战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民主普及高唱赞歌的人不同，布尔迪厄没有沉醉于太平盛世的表象里，他清醒地看到所谓的教育普及、民主深化和商品的丰富，其实正是不为认知的权力所施加的巫术效应。“支配”以更隐蔽的方式悄然无声地

进行劫夺。

2. 物质结构：符号权力的基本维度

虽然布尔迪厄的研究不断触及文化再现、表征、分类等級等问题，但是他从未放弃对物质力量作为文化的根本维度的强调。社会分配、制度体系、场域竞争等物质性内容，在布尔迪厄眼里是形成文化区隔和文化误识的最终力量。这一态度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基本一致的。^①意识形态在马克思那里，具有“错误意识”、“虚幻意识”的内涵，然而随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意识形态范畴越来越清晰地将观念和现实两个领域联系起来。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正是揭示观念对于现实矛盾、物质权力的掩饰和遮蔽，对于现实等级的虚假解决或置换。60年代布尔迪厄和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有过深入地交流和对话，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说”对他不无影响。

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纳入到社会的物质结构领域中来讨论。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和物质性的国家机器密切相关，因此统治性的国家权力分为两类，其一是强制性、镇压性国家机器，如政府、行政机构、警察、法庭和监狱等等，它们通过暴力或强制方式发挥其功能；其二则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政治、法律、宗教、教育、传媒、家庭、工会以及诸多文化方面（如文学、艺术、体育等），以意识形态方式发挥作用。阿尔都塞的贡献在于把意识形态理论和社会物质机制及其功能联系在一起，揭示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政治无意

^① Bridget Fowler, ed. *Reading Bourdieu On Society and Culture*, Oxford: Black Well Publishers , 2000, p. 2.